《学术界》(月刊)
总第218期,2016.7
ACADEMICS
No.7 Jul. 2016

萨义德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论[*]

○ 张春琴[1], 张春娟[2]
(1.西安科技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2.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知识分子问题是萨义德文化批评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考察了后现代语境下萨义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认为福柯意义上的"不屈不挠的博学"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界定和要求,"流亡性"和"业余性"则是达到这一要求的途径和条件。由于知识分子在人文主义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其人文主义文化批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对于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萨义德;知识分子;流亡性;业余性

知识分子问题是萨义德人文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萨义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学术研究的起始。早在《开始:意图与方法》中,萨义德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知识分子,但已经涉及到了后来一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流亡性和局外人特征。作为一位深具人文主义精神的批评家和实践家,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非常关切,这一问题成为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作为其批评理论的实践主体,知识分子在萨义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的开始,萨义德明确地指出,其人文主义研究的目的是要考察在错综复杂的国家、民族、社会关系中,人文知识分子在具体实践中的态度和责任。

作者简介:张春琴(1979—),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张春娟(1975—),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

〔*〕本文系2013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主义与文化批评——萨义德文化批评思想研究"(2013J069)的阶段性成果。

一、知识分子的博学性

在 1993 年应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所作的瑞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中,萨义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局限在理论层面上,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界定,即福柯意义上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在演讲的一开始,萨义德就提出了一个与知识分子群体有关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还是一小群极少数的精英?对于这一问题,他援引了两个极端观点,即葛兰西和班达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在分析总结 20 世纪初中欧和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制定的一种文化策略。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初级教师、教士和低级行政官吏。由于其知识范畴和工作性质的相对封闭性,这类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很少受生产方式变革甚至是社会革命的影响。他们相对独立于大众利益和其附属的统治阶级利益,主要以文化生产和传播为己任,很少与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联系,因而也很少参与社会变革。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的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某一阶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用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团体。此处的“有机”主要是指知识分子身份和社会职责,他们与大众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实际上,有机知识分子也就是大众的一部分,主要包括技术工人、政治经济专家、企业家、政治家、作家以及军事、法律等系统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与所属阶级或集团具有同质性,在利益上休戚相关,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活动,寻求集团利益。因此,葛兰西概念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限于文化精英或超然物外的“纯粹”知识创造者,相反,他们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社会干预意识,是人类知识、文化、精神的实践者,因而也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历史地看,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是两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如果仅从劳动内在性这一范畴上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葛兰西概念中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涵盖了全部社会成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与葛兰西的观点相反,班达认为知识分子范畴是非常严格的,它只包括少数社会精英。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超人的智力和坚持正义的勇气,构成社会的脊梁。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经典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写于 1927 年,但其影响持续至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书中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状况也适应于当下。班达在写这本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这一事件,再加上持续了 12 年的德雷福斯案对班达及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当时,在对这两件事情的态度上,知识分子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奋起反对狂热的种族主义和战争杀戮,要么放弃自己的职守,成为政治激情的牺牲品和极权主义的帮凶。令班达深为痛惜的是,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后者,背叛了其理应坚持的道德和社会公正。在该书 1949 年版序言中,班达一再强调,捍卫正义、理性等永恒不变的真理

和人类道德价值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像这样的人必然少之又少。

班达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基本上来说是保守的,这一点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曾提及过。而且他也承认班达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带有乌托邦色彩。但萨义德依然认为班达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他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班达相比,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更切近现实,而且 20 世纪末的许多新兴行业也印证了葛兰西的看法。知识工业的壮大产生了大量技术工人、业务顾问、政策专家等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随着知识分子数量的激增,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神的引领者或人类“精神的祭司”,向广大公众讲话。相反,他们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成为福柯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而这正是萨义德所担忧的。那么,面对知识专门化的挤压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还有没有可能存在班达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对此,萨义德充满信心。他承认知识分子的背叛问题一直以来都普遍存在,但是,他依然主张知识分子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他们“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1]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但是,在现实压力和诱惑面前,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萨义德的对策是倡导知识分子的流亡性和业余态度。

二、知识分子的流亡性

“流亡”是萨义德有关知识分子探讨中一个多次论及的重要概念。早在《寒冬心灵》(1984)中他就以“寒冬心灵”来比喻流亡者的处境。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他以大量的照片和注解呈现了巴勒斯坦人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并称这本书以及之后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为“流亡者之书”。此后,在《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流离失所的政治》《论晚期风格》等论著中,“流亡”一词多次出现,成为解读萨义德知识分子理论的关键词。

萨义德意义上的流亡既指真实的情境,同时又是一个隐语,前者指肉体上的流亡,后者指精神上的流亡。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2]。从萨义德本人的生活经历看,他具有这一层面上的“流亡者”意象。作为一位巴勒斯坦人,萨义德青少年时期一直居住在英美殖民地,在英美学校接受教育,成年后定居美国。他的一生徘徊在东西两个文明之间,对流亡有着具体而深刻的体会。在《流亡之反思及其他论文》中,他说:“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不仅属于一个世界。我是一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还是一个美国人,

这赋予我一种古怪的,且不说是怪异的双重视角。另外,我当然还是一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并不是相互隔绝的;每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3]。在一次访谈中,萨义德指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他来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亲身经历过的特殊经验和生命形式,有“几乎不堪忍受的具体感。”[4]这一经验和处境对于他有关知识分子和批评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肉体上的流亡相对的是精神上的流亡,在萨义德看来,这一点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大部分知识分子一生中生活在一个社会、一个文明中,但这些人却有“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之别。前者完全属于社会,在其中游刃有余;后者则疏离于特权和社会,他们是精神的流亡者,“流亡”不仅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也成为一种新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历史上这种知识分子为数众多,萨义德提到了斯威夫特、奈保尔和奥尔巴赫和阿多诺。斯威夫特是一位以讽刺出名的作家,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中称自己是“忿愤不乐”的人,一生屡次跻身于政治但却屡次被贬。他辗转于英国和爱尔兰之间,对故土爱尔兰爱恨交加:一方面不满足于爱尔兰现状,另一方面又为爱尔兰奔走呼号,抵抗英国统治。早期奈保尔也是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居无定所,漂泊在英国、法国、印度各地,试图以一种超文化的姿态来对待各种文化经验,达到地理、文化和政治上的独立。阿多诺是萨义德在流亡问题上着墨最多的人,萨义德称他是“20 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5],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流亡知识分子。在萨义德晚期作品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引用阿多诺的著作,并一再宣称他与阿多诺是站在同一条理论战线上,他是“阿多诺唯一真正的追随者”[6]。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永恒的流浪者,他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定居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人们成长于其中的传统已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安适是以对知识的背叛为代价,而寻求庇护则是以陈腐的家庭约定为条件。因此,定居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对于这一点最好的应对模式依然是一种漂泊的、虚悬的状态,在家时反而有不在家的感觉是道德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萨义德感受极为强烈。

从其个体经验出发,萨义德发现,流亡并不仅仅意味着孤独与焦虑,它使知识分子处于某个社会的边缘,但这种边缘的位置有时会转化为某种特权,赋予人双重视角。他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种文化、一种环境和一个家,但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的视野产生了一种多个方面、多种意识同时存在的认识——用音乐的术语来说——这种认识是对位的。”[7]对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双重的视角能够使他们超越惯常的经验和文化,从一种新文化的视角反观其身处其中的文化,在两种文化的并置与比较中获得新的经验和思考方式。此其一。流亡的第二个有利之处是赋予知识分子以历史的视角,使他们不仅能够看清事物的现状,而且有能力判断造成这一现状的历史过程。在这一点上,萨义德深受维柯“人类创造历史”的启发,并充分彰显了其一贯的历史主义立场。第三,流亡意味着从寻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创属于个人的生活。如果从这一角度来

看,那么,就不会把流亡当成一种损失,而是一种摆脱了日常枷锁的自由,依照自己的兴趣和目标生活的方式,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乐趣。萨义德认为德国比较文学学者奥尔巴赫从正面意义上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流亡者的形象。

二战期间,因其犹太人身份,奥尔巴赫是从欧洲逃亡到伊斯坦布尔,远离了日耳曼罗曼语的传统,丧失了其浸染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更有甚者,几个世纪以来,他所身处的伊斯坦布尔及其代表的文化一直处于欧洲的对立面,对其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对奥尔巴赫来说,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流亡到"异端"文化的伊斯坦布尔无疑是一种"被放逐于欧洲之外的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8]。然而,正是这种极端的形式促成了他的巨著《摹仿论》。萨义德指出,《摹仿论》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重新肯定西方文化传统,而是对这一传统的疏离。在奥尔巴赫身上,流亡从一种牺牲和挑战转化成了积极的文化创造和革命。正如奥尔巴赫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所言,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一个语文学家最珍贵的、不可缺少的遗产,但是,只有首先远离它,超越它,这一遗产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效地。因此,"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是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流亡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9]当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可能无法重复阿多诺或奥尔巴赫那样真实的流亡处境,但是,在当下,流亡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生活态度,或至少是学术研究态度。

三、知识分子的业余性

对于知识分子的业余性这一问题,萨义德借鉴了法国作家德布雷(Regis Debray)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中,德布雷梳理了法国近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变迁,认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实验室、图书馆、大学和出版社,那时他们是知识的拥有者和创造者,构成社会中的"家族"。但是,到6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开始大批离开其庇护所,走向大众媒体和社会公共机构,并从中获得利益和权力,与之共兴衰。这一转变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精神领袖的传统身份,成为仰大众鼻息的知识工作者。对于德布雷描述的现象,萨义德基本上持赞同态度。他认为19世纪的知识分子如屠格涅夫、左拉等人强调独立的个性和反叛思想,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但到20世纪以后,大量专业知识分子团体出现,受雇于企业或政府机构,其知识分子身份开始受到质疑。

但是,紧接着,萨义德提出了他的问题,即在新闻业、企业和政府部门中有没有可能存在独立、自主、不受制于其所属机构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个性与其集体性有没有可能并行不悖?对于这一问题,萨义德认为应该以兼顾现实与理想的方式加以考虑。仅仅因为知识分子在某一机构谋生就指责他们

是背叛者的做法太过武断,而且也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因为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对此,萨义德提到了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古尔德在其演奏生涯中长期与音乐公司签约录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从对立的立场对古典音乐进行反偶像阐释。此外还有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和汤普森(E. P. Thompson)等历史学家,他们在学院内改写了历史书写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了生存躲在庇护所后,噤若寒蝉。在萨义德看来,"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该为人所听闻,实际上应该激起辩论,可能的话更要挑起争议。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10]。他们的职责是"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11]这也就是萨义德一再强调的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责任:以语言和知识介入社会,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践行自由、平等、公义等西方人文主义理念。

至于知识分子精神在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威胁,萨义德认为这一威胁与其说来自外部的商业化,不如说来自知识分子本身的"专业态度"。这一专业态度的兴盛导致严重了的社会问题。其一,知识的专门化教育深刻影响到了个人整体知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个体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所熟悉的知识领域就越狭隘。具体而精深的研究使知识分子无暇及他,其专业知识之外的综合能力、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受到限制,从而丧失了其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正如保罗·鲍威所言:"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活动常常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制订规程,杜绝综合性的知识生产活动产生权威和影响,从而加速现代的文化失忆和文化分解进程。"[12]此外,工业流水线式的专业知识生产方式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这是以完整的知识和独立的思想为代价,"知识的任务被打碎了,细化成越来越小的构成部分,知识工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一样,通过集中、重复地运用狭窄范围所限定的任务,而实现精通和熟练"[13]。其二,知识的专门化严重影响到了公共空间的自由与公平。随着学科的细分和知识专门化程度的深入,各个专业之间真正做到了隔行如隔山,呈现出一种分裂割据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其他专业领域人员或普通大众无法进入其中,而专业内部人员也由于其话语定位而很难与公众沟通。这样,"现代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会阻碍并掩盖综合性的见解,而且还可能剥去那几个依然能创建综合认识以解释我们的过去、使过去成为我们的合法遗产的声音的权威,甚至迫使其沉默"[14]。久而久之,这一专业态度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退缩到私人空间,对公共事件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宽容和接受,公共空间的利益和秩序受到威胁。

作为一位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批评家,萨义德特别注意到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化现象。他发现,自新批评理论以来,文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技术上的形式主义。技术专家们用冷冰冰的语言工具对作品解剖,其结果是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在各种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大潮中被逐渐淡化,文学研究也逐渐转化为语言和结构技能。这一方面戕害了知识分子的兴奋感和创作感,另一方面

也使他们归顺于体制之内,按别人的指令行事。听命于人已成为他们的专长,而这一“‘专长’到头来几乎和知识不相干”[15]。

在谈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文学批评状况时,萨义德概括了四种类型:实用批评、学院式文学史、文学鉴赏与阐释和文学理论。在他看来,这四种批评类型都有“专业化”之嫌,都代表着专门化和精确的知识分工。这就出现了对“专业技术的崇拜,而且通常来说,这一崇拜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专业技术通常都是为社会中央权威服务的”[16]。在萨义德看来,造成文学批评领域专业化倾向的主要元凶是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状态可以说是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生存于其中的文化境况。这是一种否定性的理论思潮,它质疑一切绝对的真理,主张化“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微观叙事”,有一种彻底的反中心主义倾向。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最为基本的特征是其质疑与批判精神。但是,正如萨义德所言,无论这一精神如何激进与彻底,它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思想和理论领域,很少论及社会现实和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而理论崇拜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僵化,它通过高度专业化的、晦涩的语言切断了理论与外界的联系,最终只剩下理论本身。在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家那里,所谓真理、正义、解放、人类关系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语言关系,而“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它立即确定提出问题的人、接收问题的人和问题的指谓: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关系了”[17]。在语言游戏中,甚至连海湾战争的真实性都遭到波德里亚质疑,认为它不过是一场由媒体操纵的“超真实的非事件”(a hyper - real non - event)。既然战争是超真实的,那么,发动这场战争的主体美国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谴责,对处于战争深渊的人们也就没有必要予以同情和支持。在语言纠葛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把握和进行严肃社会批判的能力,他们的批判精神只有在语言和概念中才是有效的。

萨义德对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关于解放和启蒙这类宏大叙述已经消失的观点非常反感,并在多次场合公开表示反对,提出其平等、自由、解放等启蒙人文主义思想与之抗衡。他认为大多数后现代理论都有一种简单化、极端化的倾向,在极力论证其理论合理性的同时,牺牲了对世俗世界的关注,因而也就不能够恰当地解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萨义德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类的自由和知识”。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其使命仍然任重而道远。

针对知识领域的“专业化”倾向,萨义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与之对抗。他认为,在这个充满权威和专业态度的时代,知识分子应有一种业余心态,即“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18]。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有权利而且更有义务对任何专业化行动提出道德质疑,激起讨论,动员更多的民众参

与争议,这些都是专业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在 1991 年发表于南非的演讲《认同 · 权威 · 自由:君主与旅人》中,萨义德以君主与旅人来比喻知识分子不应该以独霸一方、大权在握的君主自居,而应成为随时准备跨越边界、出入不同领域的旅人,在无休止的旅程中追求知识与自由。而萨义德本人正是这一形象的实践者,他的著作涵盖了文学、哲学、历史、文化、政治、人类学以及音乐等多个领域,这一方面显示了他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深厚的知识积淀,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他勇于跨越界限,挑战专业知识的业余态度。

四、结　语

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问题是萨义德人文主义文化批评思想中一个重要议题。就中国来看,虽然中美两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背景、历史经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萨义德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划分(政策型知识分子和学院型知识分子)及其存在状态的描述大致与中国当前知识分子的情形相符,中国知识分子同样也面临着萨义德所提出的问题:政策型知识分子如何在"政府喉舌"和"社会良知"之间寻求平衡?格格不入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如何从圈内走到圈外?萨义德为知识分子标注的"不屈不挠的博学""流亡性"和"业余性"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算不上一种有效出路,但至少为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注释:

〔1〕〔2〕〔5〕〔9〕〔10〕〔11〕〔18〕〔美〕爱德华 · W ·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 16、45、49、57、62、65、67 页。

〔3〕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97.

〔4〕Edward W. Said, Interview with Diacritics, Diacritics 6.3, Fall, 1976, p. 36.

〔6〕Edward W. Sai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ed. Gauri Viswanathan, New York: Vintage, 2001, p. 458.

〔7〕Edward W. Said, The Mind of Winter: Reflections on Life in Exile, Harper's Magazine, 269 (Sept. 1984), p. 55.

〔8〕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

〔12〕〔14〕〔15〕〔16〕〔美〕保罗 · 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萧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1、111、69、1 页。

〔13〕〔美〕理查德 · A ·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听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5 页。

〔17〕〔法〕让 · 弗朗索瓦 ·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瑾山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33 页。

〔责任编辑:钟　和〕